

“二次革命”前後日本右翼及其活動*

霍耀林

[提 要]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關心”始於中日“同盟”，而其執着“關心”中國的背後，則是按捺不住的侵略野心。“二次革命”前後是日本所謂“滿洲問題”向“滿蒙問題”發展的關鍵時期，圍繞解決所謂“滿蒙問題”，日本右翼各團體順利實現合流，組成統一的聯合團體。中國國內“二次革命”的爆發，為日本右翼強硬的行動提供了絕佳的時機。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行動，謀求“中國問題”的徹底解決，對此日本政府則相對比較克制，堅持與各列強協調，漸次謀求在中國的特殊權益。由此導致右翼對政府外交的不滿，其赤裸裸的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亦成為日後日本侵華政策的禍根。

[關鍵詞] 二次革命 日本 右翼 滿蒙

[中圖分類號] K258.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1 - 0194 - 09

辛亥革命是日本對華政策改變的重要節點，給日本國內政治帶來巨大的影響，不但引起內閣的更迭，還使日本對外政策出現動搖。^①關於辛亥革命與日本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這一時期日本的對華外交，^②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袁外交，^③辛亥革命後日本對華外交的轉換^④等。而大陸浪人或右翼^⑤研究方面，主要有辛亥革命前後的內田良平，^⑥孫中山與內田良平的關係，^⑦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的中國觀及對中國革命的參與，^⑧辛亥時期日本大陸浪人的對華認知與行動^⑨等。關於“二次革命”，則主要有“二次革命”與日本的反應，^⑩日本陸、海軍、外務省在“二次革命”前後的應對^⑪等。和辛亥革命時期相比，有關“二次革命”與日本右翼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事實上，“二次革命”的爆發對日本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是日本所謂“滿洲問題”向“滿蒙問題”^⑫發展的關鍵節點，是日本右翼積極活動的一個重要時期。“二次革命”不僅為日本的右翼，也為日本政府和各派勢力提供了絕佳的活動時機，是日本日後“執着”於所謂解決“中國問題”的重要節點。

一、右翼分子的滿蒙認識

日俄戰爭後，日本如願取得了在朝鮮半島的優勢地位，同時獲得了“南滿”的利權，確立了“滿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外事警察中共調查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研究(1921-1945)”(項目號: 21BDJ083)的階段性成果。

鮮”勢力範圍。^⑬戰事甫一結束，日本外務省即派人赴外蒙古庫倫等地調查俄國在該地的活動狀況。1906年8月，三浦稔向外務省提交覆命書。^⑭1910年10月，陸軍省軍事課再次命關東都督派人赴滿蒙調查。^⑮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出於對俄國在滿蒙地區勢力的戒備，對該地區非常關心。

辛亥革命爆發後，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內閣決議：“關於滿洲，暫時維持現狀，為防止侵害，伺機漸次增進利權。至於滿洲問題之根本解決須待對我最有利之機會，期勝算相當大之時，方為上策。”^⑯可見此時日本政府的認識尚停留在所謂的“滿洲問題”之上。11月30日俄國操縱外蒙乘機宣佈獨立。外蒙的動向引起日本的擔心，日本陸軍首腦迅速行動，指責政府外交軟弱。

1912年初，受外蒙影響，內蒙、滿洲等地出現動搖，在日本陸軍的授意及支持下，以川島浪速等人為首的右翼積極行動，策動滿蒙獨立，是為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雖然該運動由於日本政府的反對而受挫，但由此不難看出陸軍及右翼對“滿蒙”的野心。^⑰其後，日俄圍繞內蒙展開多次交涉，同年7月第三次日俄協約簽署，“滿蒙”一詞自此作為一個新的地域概念正式在日本開始出現。

川島浪速不甘心於失敗，在當年8月25日即向外務省提出《對支管見》，聲稱日本國民一向反對帝國單純無意義的俄羅斯式的侵略政策，日本至少應該取得滿洲的一部及蒙古的東部。^⑱他還給出了一堆理由，如“將來無論中國還是亞洲出現任何強國，帝國都可以在滿蒙有穩固的立足之地，可以執亞洲霸權之牛耳，可以控制操縱諸國”，“滿蒙擁有天然之富源”，“人口稀薄”，“中國統一無望”，“到底歸於毀滅”，“必定被世界列強分割”等。28日，川島浪速再次致函外務省，提出“帝國應以和平外交從民國收滿蒙之利權，滿蒙是帝國遂行永久理想之急務，對於帝國有充分的價值”。^⑲

與有策動滿蒙獨立實際經驗的川島浪速相比，日本右翼理論的代表人物內田良平對滿蒙的認識則經歷了不同的過程。^⑳

1909年春，內田良平撰寫《清國動亂之機》，論述了中國在政治、外交、財政方面所遇到的危機，認為清政府已病入膏肓，若不斷然進行改革，勢必土崩瓦解。而東亞是否能保持和平，關鍵在於清國問題的解決。^㉑武昌起義後，內田良平更加明確指出，日本政府應確定對清方針，舉國一致，確立在列強中的主導地位，“達成改造中國的大業”，進一步鞏固日本在滿洲的權益，擴大在長江一帶的利益圈，發展日本在大陸的勢力，掌握亞洲大陸和太平洋地區的盟主之權。^㉒

1911年12月8日，內田良平在《支那革命調停案》中寫道：“東邦問題之解決在於支那問題之解決。支那問題之解決不僅關乎東邦之和平，也關係世界之和平。……支那問題如何解決不僅是東邦百年之大計，也是日本永遠之大業。”他認為中國陷入動亂，可能會招致列國的干涉，日本應利用優越的位置，積極“指導”列國，以達成“改造”中國的目的。日本欲“指導”列國“改造”中國，第一步即應召集革命黨及獨立各省代表組織新政府，承認革命黨政府為交戰團體，同時居於清政府與革命黨政府之間作為調停者，以期中國問題的“解決”。值得一提的是，內田還在該案的最後指出，有輿論認為應該幫助清政府鎮壓革命黨，以此為條件割佔中國領土。內田認為這將進一步導致中國被瓜分，不僅有悖於“中國保全主義”，也會讓列國逞饕餮之欲，不僅會讓中國大亂，而且有害於“東邦前途之大計”。^㉓

此時，武昌起義爆發未幾，內田良平雖然看到了日本在中國擴張權益、確立日本的亞洲盟主地位的時機，但此時似乎尚未將滿蒙聯為一體。1912年7月，日俄協約簽署，但一方面由於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剛剛遭遇失敗，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控制北京政府，日本右翼分子不得不暫時按捺住向滿蒙擴張的野心。關於中國問題，內田良平於9月指出，“我日本帝國基於現狀及位置，須盡最大努力，迴避、防止中國領土分割，在最後時機到來之時，排除種種障礙。而今日本羽毛

未豐，而盲從愚論俗議，怠於軍備擴張，不能進行行政改革……”²¹ 11月，內田良平著《日本之三大急務》，明確提出日本應基於建國的國是方針，確定根本政策，喚起國民自覺的精神，充實軍備、整理行政、振作外交，以遂行世界政策。1913年3月，內田良平進一步就政局調和提出補充財政、制定國防計劃、改革制度以緩和人心等主張，藉以收買政黨、資本家、實業家等人心。²²

此時日本國力不逮，不得不在列強中堅持“協調”及中國的保全。之後，內田進而在《革命後對支鄙見》中明確指出，中國的富源在南方，南方的利權為列國所垂涎，列國競爭的焦點在長江流域。而日本的經濟勢力範圍在北方，若由於滿蒙問題招致中國民族的反感，則南方的經營亦決不可期；如若日本不能鞏固北方的政治、國防地位，不僅不能制中國分裂之勢，不能期保全東亞大局，南方的和平經營亦到底無望。故滿蒙問題的解決不僅是鞏固北方經營的基礎，亦是保全東亞大局，和平經營南方的先決問題。滿蒙問題不僅在政治上、國防上不可等閒視之，南滿、東蒙在經濟上亦是不可棄之要地，不止農業、礦業及貿易上有前途，而且由於帝國每年五六十萬人口的移民，使得帝國在北方可以堂堂正正進行殖民地建設。²³ 此時的內田良平已明確指出所謂“滿蒙問題”對日本政治、經濟、國防的重要性。

6月，內田良平進一步指出：“當今之時，解決中國問題，以圖保全東亞大局，是二十世紀帝國的使命，亦是當下最大之急務。而欲解決中國問題，保全東亞大局，主要是在大陸建設帝國的基礎，與列國保持均勢，這是吾人今日領天下之先奔走於滿蒙問題根本解決的原因。”²⁴ 在內田看來，中國統治的前途無外乎三，一是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二是國民黨的理想民主政治，三則是袁世凱與國民黨的南北分治。他還通過分析各國在中國建設鐵路的情況，認為中國正在走向分裂，日本應在此時果斷解決日俄戰爭以來的滿蒙懸案，之後採取北守南進之策。

到此時，內田良平已經完全拋棄了自己曾經提倡的保全中國論，指出其時正是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時機。而其所謂滿蒙問題之根本解決，不過是將滿蒙的統治經營均歸日本，在他的言說中，此乃列國夙來所默認，也是中國部分“有識之士”所預期，若不斷行解決，則會成為中日兩國紛爭的禍源。²⁵ 1913年7月26日，“二次革命”爆發之際，內田良平上書山本權兵衛首相指出：“一、帝國政府承諾滿蒙人在其自由行動之下建設南滿及東蒙獨立政府；二、帝國政府承諾滿蒙獨立的同時，仿外蒙古自治之例，在滿蒙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擔當折衝之勞；三、滿蒙海關稅及鹽稅等已擔保外國借款，帝國政府應取之亦為妥當之處置；四、承諾滿蒙政府的同時，帝國政府應與之締結特殊條約，作為我保護國統監之。”²⁶

不難看出，自武昌起義爆發至中華民國成立，再到“二次革命”爆發，內田良平不僅從“滿洲問題”發展至“滿蒙問題”，還從所謂的“保全中國”進一步發展為日本應“果斷解決滿蒙懸案”，並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略。這種改變一方面體現在國際形勢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二次革命”的爆發，讓這些右翼分子看到了謀求滿蒙特殊權益的機會，並不失時機地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解決的方略。當然，覬覦到機會的不止是個別右翼分子，還有一直“孜孜”以研究所謂“中國問題”的右翼團體。

二、右翼團體的滿蒙認識

近代以來，隨着西風東漸，傳統的東亞社會遭遇西方列強的強烈衝擊，嚴峻的形勢下，“同文同種”的東亞內部產了共同抵禦列強的“同盟”論，之後演繹出“文化亞洲”，最後則變異為與“大陸政策”相關的侵略主義。²⁷ 可以說，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關心”，正是始於這種“同盟”之論。從振亞社到興亞會再到亞細亞協會²⁸，作為早期亞洲主義的代表，有不少主張侵略的右翼分子混雜期間，其

主張當然也雜糅侵略中國的思想，為日後亞洲主義的異變奠定了基礎。³²而自振亞社之後，日本各類東亞研究組織林立，甲午戰爭之後，大陸擴張甚囂塵上，而在日韓合併之後，這些組織團體逐漸從對於東亞的關心轉變為對中國的“關心”，亞洲主義逐漸演變為“支那保全論”。有學者指出，這不過是“用來束縛其它帝國主義者手腳的一種手段、方法，以使日本這一個後起的殖民國家，能在積聚力量之後，跟其它殖民國家較量”。³³辛亥鼎革之後，各右翼團體紛紛行動，東亞同文會向外務省提出《對支那經營助成案》³⁴，內含 14 條具體方案，如在中國通商港全部設置領事館、設立對中國通商誘導館、日中觀光團誘導、外務書記生特別養成、特種學生養成、中國調查編纂出版、中國內地實地調查、大漢字新聞經營、中國國都派遣駐在員、向各省城派遣駐在員、商工中國學生的培養、在東京中國學生的指導、創設日中俱樂部、設置待賢館等。

1912 年 10 月，根岸佶、中野二郎、松平康國、中西正樹等 13 人聯名向日本政府提出《對支那時局卑見》³⁵，其中指出：“對於俄國在外面的活動，日本宜收內蒙為勢力範圍”，日本應“收購奉天至新民府京奉鐵道的一部分，將其延長至內蒙，鋪設經庫倫、赤峰至張家口附近的鐵道”，“與俄國交涉使其放棄庫倫至張家口的鐵道鋪設計劃”，收“鋪設吉會鐵道之權”等。

1913 年 8 月 1 日，大竹貫一、岡部伊三郎、中西正樹、中井喜太郎、望月龍太郎、五百木良三等致書外務大臣牧野伸顯，希望日本實行自主外交，“以南滿內蒙處分為大陸政策的原則”。而滿蒙形勢無論如何變化，如維持現狀，將依然在中華民國治下。日本應乘此機會，進一步發展滿蒙勢力，至少應獲得居住權強制移民，取得勢力範圍之實。³⁶

不難看出，隨着“滿蒙”成為“問題”，尤其是“二次革命”爆發前夕，標榜研究中國的日本各右翼團體迅速行動起來。而正如《朝日新聞》所指出：“一直以來，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討論團體甚多，合計有十八之多，近時隨着滿蒙問題的浮現，各團體皆爭前恐後提出各自對中國問題的態度，結果卻相反導致輿論的不一。為此在野的有志呼籲成立統一的團體，以統一的主張喚起輿論。”³⁷

1913 年 6 月 5 日，犬養、尾崎在築地精養軒主持召開“對支問題發起人預備會”，起草宣言書，並計劃在 13 日召開“對支問題大會”，聯合在野名士發表宣言書，以期改善現政府的對華政策。³⁸

6 月 29 日，《朝日新聞》報道稱，由大江卓、小川運平、川島浪速、川久保健、田川大吉郎、中村弼、中西正樹、中野常太郎、內田良平、山縣知遠、松村雄之進、肥田景之等 12 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將於 7 月 3 日發起成立“對支研究會”，主要就中國問題等展開研究。³⁹這些發起人很多是前述各個中國研究團體的成員，當然也有如川島浪速等業已積極投身滿蒙獨立運動的實踐者。

7 月 3 日，對支研究會如期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該會設立旨趣及相關規約。決議稱“帝國對支那所執之方針政策，首先於滿洲嚴守帝國之優越地位，之後可圖內蒙古之開發，以掣肘列國對支那本土的分割趨勢，南方乃帝國經濟勢力所在，而滿蒙問題之解決乃當今最大急務”。⁴⁰從決議可以看出，對支研究會的成立乃是為推進日本國內對於滿蒙問題的解決。《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也明確指出：“及第一革命成就，與預期相反，天下歸於袁世凱掌中，不獨滿蒙問題的解決陷於困難，其中無視滿蒙之重要性，甚至有人提出了放棄論，因此斷然訴諸輿論，希冀通過國民之力而解決”，對支研究會由此產生。⁴¹

對支研究會成立後，為擴大影響，增強勢力，積極聯合既有研究“中國問題”的各團體。至 19 日，支那同志會、浪人會、健行會、東邦協會、太平洋會、日華實業協會、日東俱樂部、亞細亞義會、立憲青年黨、興龍會等十多個團體均表示贊成對支研究會之主旨。27 日，在對支研究會倡導下，浪人會、日東俱樂部、日華實業協會、東亞青年協會、太平洋會、大陸會、對外硬青年會、對支同志會、南洋

協會、健行會、黑龍會、亞細亞義會等 12 團體正式組建對支聯合會。⁴²從公佈的“對支聯合會規約”來看，該會之成立目的在於確立日本對華的方針政策，冀圖解決滿蒙問題。⁴³而這一目的與之前對支研究會成立之主旨一致。也即，對支研究會的發起主旨得到了日本國內中國研究相關多數團體的贊同或支持。由此也可以反映出當時日本國內中國研究各團體的傾向。

從對支聯合會成立之旨趣來看，該會相信解決滿蒙問題之時機已經到來，為此糾合各對支團體，以圖國論歸一，進而敦促政府當機立斷解決滿蒙問題。⁴⁴8 月 17 日《朝日新聞》報道，對支聯合會召開大會，與新聞通信記者交換意見，並就活動方法進行協商，針對國內對於滿蒙的經濟價值尚未有充分的瞭解，擬刊行詳細的調查書，使民眾能悉知真相，同時努力喚起輿論。⁴⁵

三、右翼的活動及新趨勢

1912 年，由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起草的《關於支那外交政策綱領》指出，“基於日俄協約劃定勢力範圍及帝國於南滿之特殊地位，世人皆叫囂滿洲問題解決論等，近來，隨着第三次日俄協約簽署，勢力範圍擴張至東蒙，原先叫囂所謂滿洲問題解決論者，如今更進一步，開始叫囂滿蒙問題之解決……所謂滿蒙問題之解決，往往意味着領土的獲得，帝國須割取與南滿相連接的內蒙古東部，以解決該方面問題”。⁴⁶由此不難看出，隨着第三次日俄協約的簽署，“滿洲問題”發展成為“滿蒙問題”。不僅如此，阿部守太郎還清楚地意識到所謂“滿蒙問題”的解決，不過是割取獲得領土而已。他指出，這方面的企圖既得不到中國的承認，也與保全中國領土主義相衝突，與日英同盟、日俄協約、日法協約、日美協商等明文相矛盾。如果日本貿然行之，將會累及自身利益。

“二次革命”期間，正值日本第一次山本內閣（1913.2~1914.4）時期，時任外務大臣的牧野伸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其在任雖然只有短暫的一年多，但最焦慮的莫過於對華外交。其在就任之初，即向支那研究會提出警告，並指出研究中國者的態度非常重要，彼等挾私情，任由感情埋沒理想，不去追求事情的真相，而輕易下論斷，強迫執行，不僅擴大了地理之差，也成為國交之誤的根源。牧野進一步指出，日本與中國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深入評論中國內政雖不可免，但有名望的重要人士毫無顧忌地說三道四，甚至進行諷刺性的評論，不僅對日本毫無利益，而且會招致對方不快，甚至有害國交。⁴⁷牧野對深入評論中國內政表示反感，恰好從側面說明了當時右翼勢力在日本國內掀起的輿論狂潮。

1913 年 9 月 4 日，針對“二次革命”期間在中國漢口、兗州、南京發生的三起事件⁴⁸，對支聯合會召開緊急幹事會，批評政府為保持國家威信及保護居留民宜迅速採取強硬手段，根本解決“中國問題”。⁴⁹翌日，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在街頭被暗殺。據調查，兩名刺殺者均屬對支聯合會成員⁵⁰，其中主犯岡田滿年僅 18 歲，行刺後躲藏了幾天，9 日出現在律師角岡知良家意欲自首，角岡為此赴警視廳辦理相應手續，而就在此期間，岡田在角岡家端坐在攤開的中國地圖上切腹自殺，還用自己的鮮血把地圖的滿蒙地區染紅。⁵¹而刺殺事件主要受到了岩田愛之助的教唆，岩田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在漢陽的戰鬥中負傷，1912 年 1 月赴天津參加了鎮台爆破事件，後被遣返回日本。⁵²

就在阿部被刺殺的第二天，其宅邸收到了“憂國男子”寄送的《斬奸狀》，內稱：“我國外交徒行退屈之事，神州之國威遭受凌辱蹂躪，曾經耗費貳拾億鉅資及拾萬同胞的屍山血河用極其悲慘的努力贏得的滿蒙地區亦被置之不顧……”由此可以看出，阿部被刺殺的主要原因即行凶者對日本政府消極的滿蒙政策不滿。

而隨着這三起事件掀起的輿論高潮，9 月 7 日對支聯合會在日比谷公園召開國民大會，要求出

兵中國，散會後人潮湧至外務省，要求面見外務大臣及外務次官。一直到深夜，未得到滿足的人群還湧至外相牧野伸顯的私宅。⁵³9月9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稱：“日本過去五十年間的自制力漸衰，民眾的感情較明治時代更難抑制，過去幾日東京激昂的民眾示威暴動即是明證。吾人並不認為不能對支那人表示憤怒，唯其憤怒已經過度誠乃遺憾。”⁵⁴可以看出，利用此三起事件，右翼在煽動輿論，借助民眾向政府施壓，以貫徹其主張，至少在此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牧野伸顯認為，部分人士對中國人物的評論或對中國內政的批判，未必是國民一般的輿論，或為一時感情之衝動而未考慮日本永遠和平之言行，或所謂代表日本論者，反而更加深了中國人的誤解。牧野強調，中國的領土保全乃確保日本永遠和平的根本，應避免破壞此根本的言論和行動。⁵⁵

9月25日，對支聯合會在神田小川南明俱樂部召開對支演說會，參與演講者有入山祐次郎、小川運平、笠原文太郎、田鍋安之助、中西正樹、大竹貫一等。⁵⁶10月4日，對支聯合會關西遊說員一行中西正樹、小川雲平、櫛部荒熊、內田良平等在大阪帝國座召開演說會，7日下午在京都青年會館繼續舉行演說會。⁵⁷24日下午笠原文太郎、田中舍身、中西正樹等在神田青年會館發表演說。⁵⁸

10月24日，對支聯合會召開幹事會，議決滿蒙鐵道問題，就借款、線路、工事三點提出具體主張。⁵⁹11月1日，對支聯合會召開調查會，討論對蘇蒙協議簽署後，日本為保持勢力均衡而對內蒙採取的政策。⁶⁰不僅如此，對支聯合會還先後拜訪政友會、國民黨、政友俱樂部以及新政黨等，陳述滿蒙現狀，希望各政黨能聯合一致採取行動。⁶¹20日，對支聯合會幹事伊東知也到訪外務省，就第二大借款向牧野外相提出四個疑問。⁶²

12月20日《朝日新聞》報道稱，對支聯合會為謀求對支問題的解決，委員中西正樹頻繁拜訪各政黨，希冀各政黨拋棄政派之別，在議會採取共同一致的行動，得到各政黨的允諾。今後的行動不僅要在議會上提出批判政府外交的失敗，還能與各政黨一道持續研究中國問題。⁶³

從以上不難看出，夙來“關心”中國的日本各右翼勢力在“二次革命”前後相機而動，組成統一的對支聯合會，積極謀求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其活動方式也不再是單純的向政府建言，而是轉變為通過組織各種講演會、懇親會等發動輿論，利用民眾向政府施壓，以遂其目的。對此，日本政府相對比較克制，堅持以日英同盟為基礎，主張與列強“協調”，漸次謀求在中國的特殊權益。

1914年5月，川島浪速在總結辛亥前後日本對華外交時指出：“革命發生後，我外交以吾人觀之愈加隱微，幾多失敗，已徹頭徹尾被對手利用，其緣由皆因我外交缺乏自主的精神導致。”他還稱“滿蒙寓北京命運死活之樞機，袁的存亡關係北京之統治，操縱他並不能控制樞機，且早晚會土崩瓦解，支那由帝國最後收拾，以救濟四億萬民，行保全東方大局之天職，唯一的立腳之地即滿蒙”。⁶⁴至此，右翼對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的“執念”，已經轉化為對政府外交的不滿。而這種赤裸裸的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也成為日後日本侵華政策的禍根。

結 論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關心”，正是始於中日“連攜”，而其“執着”地“關心”中國的背後，則是按捺不住的侵略野心。辛亥革命後，隨着日俄協約的簽署，原來所謂的“滿洲問題”發展成為“滿蒙問題”，之前一直“執着”於關心中國的右翼分子及所屬團體率先行動，致力於謀求所謂“滿蒙問題”的解決。而“二次革命”的爆發，給他們提供了絕佳的時機。近代以來成立的各中國研究團體，迅速實現合流，組成新的統一的“對支聯合會”，一方面謀求統一日本國內輿論，另一方面還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向政府施壓，要求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

這一時期的日本對華外交政策方面，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阿部守太郎抑或是外務大臣牧野伸顯，均堅持基於日英同盟的中國“領土保全”主義，與西方各列強“協調”一致，積極謀求擴大在中國的權益，竭力克制過早對於中國領土的野心。這與右翼的主張及行動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也成為“二次革命”期間阿部守太郎被刺殺的根本緣由。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無論內田良平還是對支聯合會，均將發動民眾掀起輿論作為活動的重點。雖然右翼的輿論攻勢及活動沒有實現其徹底解決“滿蒙問題”的野心，但卻推動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逐漸走上更加“強硬”的道路，而其執着地謀求所謂“滿蒙問題”的解決，也成為後來日本一系列侵華政策的禍根。在此意味上，“二次革命”期間日本右翼的活動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本文初稿曾於2022年9月2日在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彭劍教授主持的“辛亥革命共同研究班”報告，承蒙彭劍教授、承紅磊教授及其他師友無吝賜教，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①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変動』、岩波書店、2009年；霍耀林：《民國初年日本對華外交的新動向》，江西吉安：《井岡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

②俞辛焯：《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③池井優「日本の対支外交」、『法學研究』、1962年。

④霍耀林「辛亥革命後日本對華外交の轉換」、『近代日本研究』、2020年。

⑤右翼這一概念產生於法國，明治維新後隨着西方思潮傳入日本。日本的右翼活動主要是明治維新後，隨着政治上被剝奪封建特權，經濟上陷入困境的舊封建武士反對明治政府展開，對內主要從國粹主義立場出發反對歐化主義，對外把攘夷思想發展為大陸擴張論。（吳限：《日本明治時期的右翼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8頁）日本的右翼絕大多數是舊武士和浪人集團。與之類似的還有“對外硬”勢力，主要指主張強硬外交、對外強硬的部分人或團體，包括政治集團、社會集團及一些“志士”。（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嚴格意義上，右翼、大陸浪人、志士、對外強硬勢力等概念有聯繫有區分，但這並非本研究主要討論的內容，本研究中的右翼泛指辛亥革命前後主張大陸擴張、對華強硬的個人、團體。為方便讀者查找及瞭解當時的情況，本文中涉及的日本團體名稱或直接引用之處均採用原

日文漢字，如“支那研究會”、“支那問題”、“對支”、“滿洲”、“滿蒙”等均一仍其舊，不作修改。

⑥趙軍：《日本“大陸浪人”與侵華戰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趙軍：《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趙軍：《辛亥革命前後的內田良平》，北京：《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初瀨龍平「內田良平と中國革命—1912まで」『アジア研究』16(3)、1969年、1~25頁；初瀨龍平「內田良平と中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期」『アジア研究』17(3.4)1971年、24~50頁。

⑦姜義華：《日本右翼的侵華權謀與孫中山對日觀的變遷》，北京：《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⑧趙軍：《“亞洲夢”與日本右翼——頭山滿、內田良平的中國觀及對中國革命的參與》，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

⑨楊棟樑、王美平：《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大陸浪人的對華認知與行動》，天津：《歷史教學》，2012年第6期。

⑩波多野勝「辛亥革命と日本の反応—山本内閣の外交指導について」、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第87号、1988年。

⑪波多野勝「中國第二革命と日本の反応—山本内閣の外交指導について」、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

際政治』第 87 号、1988 年。

⑫日本由“滿洲問題”向“滿蒙問題”的發展可以參考：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歷史的構因』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1~28 頁。本文着重考察在“滿洲問題”向“滿蒙問題”發展的過程中，日本右翼的活動狀況及日本的對華政策。

⑬1910 年第二次日俄協議明確了“南滿”作為日本的勢力範圍，而“北滿”則作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⑭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130416700、三浦稔 外蒙古視察覆命書(政-9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三浦稔畢業於東亞同文書院，曾任日本駐安東外務翻譯生、駐成都領事館翻譯生及代理領事等。

⑮「軍事課 滿洲及蒙古地方物資調査の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3022990500、密大日記 (3 冊の内中) 明治 43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⑯『日本外交文書』第 44、45 卷、別冊「清國事変」50~51 頁。

⑰1912 年 6 月陸軍參謀本部編成《俄國對滿蒙及新疆的經營》。「2 滿蒙及新疆ニ対スル露國ノ經營」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3030414500、清國革命動乱後同國边境ニ対スル露國ノ態度並行動一件(1-2-1-29_00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5 对支管見」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30302678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1-1-2-77_00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9 平和的対支外交ニ対スル私見」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30302682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1-1-2-77_00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初瀬龍平「内田良平と中國革命—1912まで」『アジア研究』16(3)、1969 年、1~2 頁。

㉑内田良平「清國動亂之機」、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芙蓉書房出版、1994 年、57 頁。

㉒内田良平「支那改造論」、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112 頁。

㉓内田良平「支那革命調停案」、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121 頁。

㉔内田良平「帝國の國是に就て」、内田良平文書研

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162 頁。

㉕内田良平「政局調和之機」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165 頁。

㉖内田良平「革命後の対支鄙見」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233 頁。

㉗㉘内田良平「対支策斷案」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235 頁、251 頁。

㉙内田良平「山本権兵衛首相宛対支政策意見」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259 頁。

㉚據學者研究，日本的亞洲主義表現為早期的“亞洲同盟論”與“中日連攜”思想，以後演繹出文化亞洲觀，最後則異變為與“大陸政策”相連的侵略主義理論。(盛邦和：《19 世紀與 20 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北京：《歷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也有學者根據日本亞細亞主義內涵的不同，將其分為“古典亞細亞主義”、“擴張的亞細亞主義”、“侵略的亞細亞主義”、“保守的亞細亞主義”、“新古典亞細亞主義”。(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無論如何區分，不可否認的是亞洲主義是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是指導日本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與西方列強爭衡政策或手段的侵略理論。雖然有部分關心亞洲前途和命運的日本人士主張“支那革命主義”，但只是極少數，並不能改變亞洲主義的主流。(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北京：《歷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㉛振亞社設立於 1877(明治 10)年，成立的旨趣為：振興亞洲諸國，挽回往昔之隆盛。發起者有曾根俊虎、東次郎、前田謙吉等關心中國及朝鮮半島事務並與海軍有一定關係的人。1880 年 2 月由曾根俊虎起草，為“聯合亞洲諸邦之士，興正道拯衰退”，振亞社改組為興亞會。1883 年興亞會改為亞細亞協會，會員以日本人為主，但也包含了來自中國和朝鮮半島的 162 名人士。翌年為培養通曉中國政治、人情、風俗、語言等方面的人才，在上海設東洋學館。

㉜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北京：《歷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㉝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年，第 269 頁。

㉞「10 对支那經營助成案」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

センター)Ref.B030302683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1-1-2-77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⑮「7 对支那時局卑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302680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1-1-2-77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11 对支那意見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302684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1-1-2-77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对支會大合同説」『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13年7月9日、4頁。

⑱「对支那問題大會」『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13年6月9日、3頁。

⑲「对支研究会發起」『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13(大正2)年、6月29日、2頁。

⑳「对支研究会成立」『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13(大正2)年、7月4日、4頁。

㉑黑龍會『東亞先覚志士記伝』原書房、1966年、552頁。

㉒『大阪朝日新聞』朝刊、1913(大正2)年、7月28日、2頁。

㉓“本會乃為確立帝國對支那之方針政策、以期謀求滿蒙問題之解決為目的”(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262頁)。

㉔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編『内田良平關係文書』第三卷、262頁。

㉕「对支連合會の活動」『朝日新聞』1913年8月17日、2頁。

㉖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外交文書』(上)、原書房、1955年、369-376頁。

㉗⑤⑤牧野伸顯『回顧録Ⅲ』文藝春秋新社、1949(昭和25)年、26~31頁。

㉘关于此三起事件与對支聯合會の行動以及阿部守太郎被暗殺等、可參考:霍耀林「辛亥革命後日本の对華外交の転換」『近代日本研究』第36号、215~251頁。

㉙「对支連合會凝議」『朝日新聞』1913年9月5日、

2頁。

㉚清原芳治『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大分合同新聞社、2003年。

㉛⑤⑤黑龍會『東亞先覚志士伝記』(中卷)、原書房、1966年、560頁、484頁。

㉜9月9日、在英國井上大使より牧野外務大臣宛「中國兵の邦人虐殺に関する日本政府の要求、列強の袁世凱援助政策の成否等に関するタイムズ社説報告の件」第127号、『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二冊、482頁。

㉝「对支演説會」『朝日新聞』1913年9月25日、2頁。

㉞「京都の对支問題演説」『朝日新聞』1913年10月7日、4頁。

㉟「对支問題演説」『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13年6月25日、4頁。

㊱「对支連合會の意見」『朝日新聞』、1913年10月25日、4頁。

㊲「对支連合會」『朝日新聞』1913年11月2日、2頁。

㊳「滿蒙問題と各政黨」『朝日新聞』1913年11月7日、4頁。

㊴「对支同支會と外相」『朝日新聞』1913年11月21日、2頁。

㊵「对支連合會と各政黨」『朝日新聞』1913年12月20日、2頁。

㊶「14 对支外交失敗之真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302687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1-1-2-77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作者簡介:霍耀林,青島大學外語學院特聘教授,四川大學文學新聞學院與新華文軒聯合培養在站博士後。山東青島 266071

[責任編輯 陳志雄]